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

大事记

1977—1992年

李君如编



学习出版社

74128431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 发展大事记

(1977—1992 年)

李君如 编

学 习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1977～1992
年/李君如编.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7. 9
ISBN 7-80116-120-3

I. 邓… II. 李… III.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模
式-政治理论-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9723 号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

(1977—1992 年)

李君如 编

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806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集团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375 印张 113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16-120-3/D·71

定价：5.80 元

再 版 前 言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同时，向全党提出了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战略任务。作出这个决策，提出这个任务，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在学习十五大报告过程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回过头来再看《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一方面，正如有些同志对我说的，读了这本书，有助于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我感到这本资料书还可以充实一些内容，使之更全面地体现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贡献。凑巧的是，出版社要重印此书以满足读者需要，这就促使我下决心拿出时间，根据

十五大精神充实资料，修订错漏之处。这就是本书再版的由来。

借此机会，感谢读者的鼓励。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理应在大家的关怀和帮助下，担负起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责任，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作 者

1997 年 12 月 5 日

目 录

序 论	(1)
一、党的探索和邓小平的探索	(4)
二、1978 年前：思想的萌芽和理论 形成的前奏	(9)
三、1978 年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5)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

(1977—1992 年)	(20)
一、命题的提出 (1977—1982 年)	(20)
二、轮廓的形成 (1982—1987 年)	(56)
三、体系的概括 (1987—1992 年)	(97)

序 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资料书。

资料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资料的汇集为全书的内容，但资料的汇集及其编排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必定反映编者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做一个编者的坦诚自述。这就是本书长篇序论的由来。

为了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必须作史的研究，即研究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轨迹。从进入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之日起，我就十分重视这种史的研究。1991年6月5日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长论文《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当时为上海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辅导准备的讲稿中的一部分内容。这篇文章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史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论的阐述。当时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思想史的考察，认为：50年代中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萌芽时期；60年代初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露端倪；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前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这种思想史的考察，在当时还是初步的，但对帮助人们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次年，这篇文章被中宣部评为第一届“五个一工程”的入选文章，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通令嘉奖。

学术研究无止境。有的同志读了我的文章后，建议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再作更细的研究。有的学者同我商榷，认为50年代、60年代党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只是参与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探索，考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不能上溯到50年代或60年代。持这种见解的同志，有的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的认为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整顿期间。这样的讨论切磋是有益的。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比较好解决。大体上，到十二大提出命题可以算一段；十三大形成轮廓又是一段；1992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对体系做初步的概括，告一段落。记得1993年6月15日至19日，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龚育之同志发表的论文《线索和阶段》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是诞生前的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新时期的

第一个历史阶段，相应地，也应该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其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一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这一阶段划分，比较符合事实，我很赞同。

关于 50 年代、60 年代邓小平同志思想史的研究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做一个说明。在我 1991 年发表的论文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起点的。但我认为这一理论如同其他理论一样，在形成之前有一个思想的萌芽、孕育时期，因此有必要探讨 50 年代、60 年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发展史。

但做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很长一段时期党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 50 年代、60 年代的探索和毛泽东同志的探索是什么关系呢？在回答商榷者质疑过程中，我对这个问题重新做了研究。研究的结论是两条：（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确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做过认真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成果，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探索成果一样，是党的珍贵思想财富，必须高度重视。而且，正是这样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出了硕果。（2）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探索，50 年代主要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其基本思路和毛泽东同志探索的思路也是一致的；60 年

代初期邓小平同志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是不同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后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萌芽；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前奏。这两个研究结论，后来在我1993年撰写的论文《社会主义建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初步探索》中，做了说明。显然，第二个结论中有一点，是对我1991年观点的修正，即把思想萌芽时期从50年代中期改为6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我提出过去的研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论文或著作，在进行史的研究时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对于党的认识和邓小平同志的认识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认识过程，进行分析和综合。因而没有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的探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探索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为党所接受的过程。

这样的反思或自我批判，写进了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书。在该书中，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的观点是这样陈述的：

一、党的探索和邓小平的探索

近几年里，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研究中，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种阶段划分法：第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1978年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一理论形成的起点，到1982年十二大、1987年十三大和1992年十四大，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三次跨越。第二种看法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党开展全面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的前奏，然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一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三种看法是，1956年党提出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整个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起点，60年代初已经初露端倪或孕育，1975年是理论形成的前奏，然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共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这里的差别，主要在思想或理论形成的起点上。

考察各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其差别在于许多同志没有对于党的认识和邓小平同志的认识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认识过程，进行分析与综合。因此，有必要进行重新研究和探讨。

党的两次探索

从党的认识过程来讲，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有两个起点，经历过两次探索：第一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以1956年为探索的起点。第二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78年新的起点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

1956年初到1957年夏天，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初步总结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与我国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寻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并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形成了许多珍贵的思想。可以说，这是党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思想萌芽，也是党最初进行的有益的探索。但是 1957 年夏天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进行了第一次失败的尝试，就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错误地进行的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在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要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上前进了一步。然而，由于党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中那些不合乎实际的或扭曲的认识，这次探索不仅没有深化，相反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路线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结果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因此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完成这一起点正确、曲折甚多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党既继承以往探索的成果，又有新的发展，终于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从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命题的提出时期，其间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提出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的认识有了一

个根本性的进步；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的形成时期，其间最重要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它标志着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党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明确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是党迄今为止在社会主义建设自由王国里取得的最大成就。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角度来考察，第二个起点（即“新的起点”）是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的真正的起飞点。

邓小平的三次探索

与此相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是邓小平同志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思想的起点问题。现在，一般都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形成的。从理论的自觉及其对党的指导作用而言，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成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崛起的一个转折点？这就不得不追溯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的思想。正是那个时期，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以及围绕这一整顿展开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并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做了思想准备。

邓小平同志自己也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但如果以1975年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起点，又碰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那时提出的思想与做法，会被“四人帮”诬为“右倾翻案”？这就要求我们考察“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根据现有文献，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与1957年就已经提出了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原则要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等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显然同以后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关系，但也应看到，这是党当时的主流思想，也即是党在进行第一次有益的探索时整个领导集体共同的思想。1975年诬称邓小平“右倾翻案”，主要指的是1962年时邓小平同志关于包产到户等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毛泽东同志当时批评邓小平同志“还是‘白猫、黑猫’啊”，针对的也是邓小平同志1962年时说的话。事实上，6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已经形成了一些和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不同的，但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因此，可以认为，60年代初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芽或孕育的起点。

从那时起，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三次探索与三次责难中不断发展，最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60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但这次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了第一次批判与责难；1975年是第二次探索，1976年又一次遭到批判与责难。从1978年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始，他开始了第三次探索，并在1979年就开始考虑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后，

他领导了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改革。直到 1978 年后第三次探索，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才为全党所接受。虽然在 1989 年我国发生政治动乱、东欧形势剧变和 1991 年苏联解体的背景下，1991 年有个别同志站在“左”的立场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提出过质疑，但党的指导思想并未因此而改变。1992 年初视察南方时，邓小平同志对党与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新的提炼，回答了各种责难。1992 年 3 月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谈话，在进一步系统地总结邓小平理论观点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崇高任务。

这种情况，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十分相似。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形成的观点并未为全党所接受，而是经过一系列曲折之后，党才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其杰出代表人物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进行科学的阐述。

二、1978 年前：思想的萌芽 和理论形成的前奏

这里，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邓小平同志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过程。首先考察一下他在 1978 年以前的思想发展脉络。

邓小平同志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在1920—1926年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自此以后，他长期来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萌芽

我国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义就不再是教科书上讲的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了。与此同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十分现实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其时，邓小平同志已经进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始了他对这一时代课题的现实思考。50年代中期，他参与了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在1956年11月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7年4月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等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他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①邓小平同志突出这一点，不仅仅是讲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是针对我国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而言的。他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主要的任务已转向“搞建设”，另一方面指出“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他告诫人们，1956年我们做的事情中，“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他提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二、面对群众的需要。”^①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强调党要接受监督，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他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②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员应该接受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三个方面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改进党的思想和作风，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从实际出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重要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5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如前所述，这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共识，还不能说是邓小平同志个人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可贵的是，在党的指导思想转上“左”的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8、270页。